



引用格式:吴伟. 城市社会的发展范式及其未来走向[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6): 36-44.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3969/j. issn. 1009 - 3729. 2018. 06. 005

文章编号: 1009 - 3729(2018)06 - 0036 - 09

城市社会的发展范式及其未来走向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future trend of urban society

吴伟

WU Wei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082

摘要: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体现为城市发展,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有不同的形态,从而形成不同的城市发展范式,各个范式之间的纠缠又生成城市发展的一般范式,如“资本—政治—社会”“情感—历史—文化”“科技—人文—生态”等。随着我国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问题、城市矛盾的日益突出引发人们对城市发展的反思。要发掘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的根基所在,把伦理范式、有限范式等融合进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的总体性范式,则需要构建以包容性、兼容性与公共性为基调的城市空间与城市制度,构建与中国特色城市社会相适应的历史文化,以有限范式的自觉合理应对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代价与风险选择,以“此在单元”的微观视域推动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树立以城市的未来引领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实践理念与实践意识。如此,才能以城市命运共同体打开城市的未来。

关键词:

城市社会;
发展范式;
总体性范式;
城市命运共同体

[收稿日期] 2018 - 07 - 26

[基金项目] 上海财经大学 2018 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 (CXJJ - 2018 - 385)

[作者简介] 吴伟 (1985—), 男, 河南省民权县人,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空间哲学、城市哲学。

城市社会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性语境。亨利·勒菲弗^[1]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城市社会。城市是人的聚集,是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聚集。因此,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与城市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城市是作为可能性存在的人的一种定在,是不确定的人的活动的一种确定性。同时,城市也是现代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的集聚地,城市发展是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张力之所在。对城市发展趋势与规律的探索,对城市发展的内涵、功能、作用的研究,意义重大:一方面具有社会存在论意义,另一方面对中国城市化的建构路径具有价值论意义。在反思的意义上,城市发展需要不同学科、不同逻辑、不同城市问题的相互交流与交融,在思想的深层激荡中,探寻城市社会的一般发展范式,激活城市发展的深层动力,实现城市的自信与自觉,在已有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追求城市社会发展更好的可能。在结构主义语境下,城市社会的发展由单个范式主导,但是其他发展范式并未消失,而是在某个主导性范式的作用下形成“范式纠缠”。反思这些发展范式,探索城市发展的规律,树立可行的城市发展目标,对确立总体性城市发展远景规划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拟通过对城市社会发展范式的历史考察,探寻中国城市社会的总体性发展范式与城市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明确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目标、价值与意义,推动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

一、城市社会的“资本—政治—社会”范式

资本的目的是实现自我增殖。资本范式注重城市物质空间扩张、物质财富增长的经济发展理念。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表现出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使社会的剩余财富不断投入到生产与再生产的扩张

链条上,通过货币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性、多样性的关系简单化和齐一化。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是通过理性祛魅奠定了世界货币化的哲学基础,而机器大工业把人与人、人与自然时空压缩与集聚在一起,工业城市的历史地位得到确立并且飞速发展起来。城市的外延,诸如人口增长、城市空间、经济指标等,成为衡量城市发展的指标,城市的发展即是资本的集聚与分工的细致化,现代社会由此迈入城市社会。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在实现自我增殖的同时也孕育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范式,寻求资本发展的政治合法性。不同的资本样态,在不同的境遇下生成不同的政治形态,总的发展趋势是:传统城市的神圣性转换为世俗性,城市成为民主与自由的表征,城市政治生命决定了国家政治生命,城市成为现代民主的政治舞台,城市的权力架构与权利诉求突变为政治范式的核心构件。因此勒菲弗认为,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其空间生产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蕴。人们通过资本通约把自己的生活世界转变为可以量化的世界,社会变成消费社会,城市的扩张引起消费的集聚,从而刺激城市的再度扩张,于是城市逐渐成为一种生活和生产空间,日常生活范式随着资本范式的侵入演变成一种消费逻辑。

“资本—政治—社会”范式所推动的社会发展展现出巨大的魅力,社会以生产为目的,政治为生产扫清障碍,社会生活成为再生产的转化器。于是现代性城市的蓝图就被这种发展逻辑勾勒出来:高楼大厦琳琅满目,商业中心与高档住宅成为城市的涟漪中心,围绕这些中心形成了大都市。资本、政治、社会三者之间的相互纠缠奠定了城市社会发展的一种路径,彰显了现代城市社会利益共同体的生成。在物质力量与物质文明层面上,其他的发展范式在以资本为主导的范式面前,相形见绌,城市社会因此披

上了理性主义的外壳,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性载体。首先,资本范式改变了等级制社会处理社会剩余劳动的方式,打破了物质文明的等级制,开拓了物质文明的大众化,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城市发展的功能性发生了改变。其次,资本范式打破了等级制的权力结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与追求使人类社会前进了一大步,世俗性权力与权利为每个人都可以生而触及,城市发展的价值性得以极大丰富。最后,资本范式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潜能,塑造符合资本发展的完成人,并形成城市发展的资本有序性。

“资本—政治—社会”范式并不是资本完全占居主导地位,在城市社会中,依然存在着政治引领资本和社会生活的范式样态,也存在着社会生活引领资本与政治的范式样态,这里只是表明三者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力。人类社会并非只有这一种发展范式,倘若如此,那么作为母体的等级制社会如何也产生不了“资本—政治—社会”范式,等级制社会的周期式振荡也无力培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城市问题与城市冲突也不断提醒我们反思“资本—政治—社会”范式的内在矛盾。

其一,城市社会主体性的滞涨。“主体是关系结构中的主动方、主导者。主体性是作为主体,也就是作为对象性关系与对象性结构中的主动方、主导者所具有的特性……人的主体地位,就是人对具体对象性关系的自觉、主导与控制程度的提升,人的主体性就是人在具体地自觉控制对象性关系的过程中所生成、展开、积累的素质、能力和特性。”^{[2]170} 主体性的发展,一方面是能力的不断提升而凝聚为具体性;另一方面是主体性的不断拓展而表现为结构的多样性。而货币关系作为抽象的一般关系,封闭了主体多样性不断生成的可能,致使社会创新能力、创新意识、创新责任不断下降。主体性的不

合理性引导社会追求消费与奢华,制造消费幻象、消费等级、享乐意识,无欲无节制的生活成为城市社会发展的现实幻象。城市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停滞了,合理的主体性被扬弃,不合理的主体性、单一的主体性又使得城市社会陷入功利主义泥潭,这就是主体性的滞涨效应,同时也是标准化主体的具体确立。

其二,城市空间的隔离与主体间性的断裂。城市是人的聚集地,也是历史的空间存在方式,城市的封闭性给人们带来安全感与安全的生活,这是城市认同与城市内部交往的一个层面。但是,社会精英所主导的城市空间生产正在消解城市的活力。城市空间的隔离也是特权的标志,社会分工与社会阶层的产生必然导致空间的隔离,并广泛地体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在资本主导下,城市空间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富人区和贫民窟,使老城区逐渐成为相对贫困的地区。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城市与城市、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它们之间的交流成为不可能,空间隔离成为空间生产的目标。在唯物史观视域下,这就是资本发展产生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城市空间隔离被放大,主体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断裂,城市主体权力与权利的断裂,使城区差异、地区差异、国别差异上升为社会矛盾并引发社会冲突。

其三,城市空间弹性的缺失。空间弹性是社会发展的张力,它既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也是流动性与差异性的统一。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权利的差异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但这种差异如果过大或固化又会造成城市空间的固化。“资本—政治—社会”发展范式造成的城市空间弹性的缺失,一方面导致空间的私有化,另一方面又导致空间的固化,使私有制变为资本运行的手段,人的自由与平等变为货币的自由与平等,启蒙运动的天赋人权理念

变为实体性的天赋财权,君权神授的贵族等级制变成资本等级制。程序性的公平只是形式上的公平,其结果必然产生贫富差距,最终导致生产与生活的无序、无限制,引发经济周期性振荡和经济危机,在政治上的固化表现为政治献金,在社会生活上的固化表现为碎片化的符号社会。马克思^[3]据此把资本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并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这同样说明了城市空间的固化,因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城市社会发展弹性的萎缩过程。对此,大卫·哈维在《资本的限度》《社会公正与城市》《资本的城市化》等著作中作了批判性的分析和研究。

二、城市社会的“情感—历史—文化”范式

“情感是人与世界、人与自身等关系的一种深层触发,是人性之总体性、完整性的一种内向性确立与升华……情感是人作为总体性、精神存在的一个本体性内容,是人存在与行动的一种重要的本源性的支撑与深层动力,是人的生存与活动具有意义与动力的重要原因……情感最根本的问题是,作为对象性存在物,人自身的归属问题,是从根本上可以把自己托付给谁的问题,是信任谁,把本体论的信任交付给谁的问题。”^[4]情感的精神性存在属性,往往被误认为是非理性的东西。情感的非线性与偶然性是理性摒除的对象,的确需要普适的理性加以规制。然而情感的非理性特征并不能否定情感的稳定性。国家情感、宗教情感、民族情感、家庭情感、职业情感、阶级与阶层情感等作为社会关系,一方面维持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也维系

社会关系的稳定,情感的形成与发育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精神纽带。例如,资本的发展就是将情感转化为契约精神,把合同变成信任的载体,使商业精神从情感的种子里逐渐培育出来,成为城市社会情感的一个重要维度。情感虽不能被还原为“经济—政治—社会”范式,但是情感的产生并不是一个自然生成过程,不但其内容逐渐丰富,也有自身的变化与演进规律。在战争年代,国家情感与民族情感会上升为社会主要情感;在和平年代,职业情感与家庭情感又会上升为社会主要情感。例如,在中东地区,石油利益的争夺是导致危机的一个原因,宗教冲突与宗教情感的矛盾激化也是危机的诱因之一。情感范式的稳定性与确定性的重要支撑和来源是历史传统。历史传统是人们在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中调适自身的一种积淀,也是任何文明持续存在的重要依据与文明主体的标志;历史是人们确定性生活的塑造机制和凝聚机制。在城市社会中,历史传统内含的社会认同、社会情感与心理、社会信任与社会依赖感、归属感的重要场域就是城市。马克斯·韦伯认为,历史意蕴是政治权力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方式。没有历史支撑的政治权力必然被政治逻辑边缘化。片面强调现代性的正当性,完全颠覆历史传统的社会发展是无根的,不仅仅是短视,而且也将导致文明发展的深层动力不可持续,以及规模发展与内涵发展的断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认为,历史与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与动力,任何强制性改变和抛弃历史与文化的行为必然阻碍社会进步,文明断裂的原因就在于对历史与文化的干预。历史遗迹虽然淹没在城市社会,但是历史文化通过不断演化、不断融入当代人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会形成历史的发展与转换,不断打开人们的文化范式。文化范式强调人的精神性和主体性。在城市社会中,城市一方面是地理空间性场域,另一方面

是文化有机体与文化共同体,在继承历史文化的同时不断表达城市主体的内在需要,形成鲜明的内在特质,并且把这种内在特质外化、对象化和符号化。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范式是主体性的精神定在,城市文化是社会发展的精神根基。

在城市社会,“情感—历史—文化”范式的深层本质是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在当代社会的表现,“城市精神作为城市理性、当代社会理性的核心,是以市民社会为形成、实践主题,为大多数城市人群所认可、遵守的共同意志”^{[2]193}。首先,城市精神的本质内容是社会认同,即对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的主体性观念的凝结,是市民的共同意志的集中表达。在城市中,个人的能动性在社会关系结构中被放大,但个人的城市权利并没有被取消,人们的个人意志与情感上升到了社会层面,获得了社会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由此而形成的城市精神是包含个体的社会公共性,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前提条件与重要因素。其次,城市精神是城市社会的灵魂,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城市精神,不存在统一的世界性城市精神。城市精神的特殊性与多样性源于城市之间差异性,只有承认这种差异性,才能认识到占主导地位的城市精神,确立具体的城市价值观,实现城市精神、城市情感、城市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构建城市社会的软实力。然而,目前,城市精神也存在着发展困境,即城市精神构建的自觉性缺失。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情感的撕裂性。情感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已是现代城市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两条平行线,情感的合理性载体缺失,导致情感的释放依赖于酗酒,甚至是毒品。情感的碎片化使情感与情感之间撕裂,情感的这种固化使得情感的本质属性即共同感丧失。碎片式的情感富集与情感黏性,造成情感之间的排斥和以情感划分

的圈子文化。情感的断层又进一步造成情感冲突,致使情感的本体性安全无处安置。

其二,历史传统生成的危机性。城市社会与历史传统的连续性问题是指,历史作为过去式是不是标志着落后?城市社会的自身传统如何形成?是否可以用一个城市标准作为所有城市发展的目标?城市社会发展的目的是否意味着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就当下而言,城市发展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即历史传统被精英文化所控制甚至抹去。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是因为既有历史文化的消失与压缩,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的历史文化形成的动力缺失,从而造成城市精神危机。例如,既有历史文化中的春节,家乡的与城市的始终是两个味道;返乡文化和春运文化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新的历史文化。如何构建新的历史文化仍然是今天值得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三,文化的裂变性。城市是多样文化的集聚,差异性文化形成不同样态的亚文化,文化的差异性既是主体间的差异性,也是人的精神需求的细化。文化危机一方面是文化的自信缺失与过度自信,另一方面是虚无、孤独的主体性危机。文化的非自足性要求城市文化与经济发展、生态发展、制度发展和政治发展有机统一。文化发展的空间不能盲目从属于其他发展范式,既要避免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文化工业,也要走出让·鲍德里亚所指出的符号文化的迷魅,这是城市社会面临的时代问题。

三、城市社会的“科技—人文—生态”范式

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反映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实践能力的重要指标。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改变人们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与自然的交往方式。科学技术范式的核心是揭示人与自然的关

系问题。黑格尔认为,自然是非独立存在的,有其内在运行的规律,自然的逻辑就是自然的主体性。随着人们实践能力的集聚与实践场域的变化,科学技术问题也成了城市问题。城市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范式在宏观上分为人类中心主义和反人类中心主义。以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为标志的人类中心主义,一方面,承认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之中的先在性与优生性,认为人的发展就是征服自然,向自然无限地索求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认为科学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导致自然资源不断枯竭,直至影响到人们的生活,造成了生态危机。法兰克福学派与之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批判科学技术的这种不顾后果的工具理性属性,将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激化称为浅层生态观。美国生态学家、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奠基人利奥波特认为,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主人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以利奥波特为代表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自然也具有生命,自然的神圣性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意识上与自然及其他生物进行移情式交流,只有尊重自然的一切生命,尊重自然的内在逻辑,人们才能获得幸福。在微观层面上,科学技术的聚集产生了大城市。以城市为中心重构生态圈,工业的时空聚集打破了原来的生态循环,使传统农业向工业和商业靠拢,科学技术在不断解决城市问题的同时也诱发了新的城市问题。例如,城市的热岛效应、二氧化碳排量的增加导致的气温升高,需要人工制冷技术加以解决,而大量的空调设备又造成大气层臭氧量的降低,导致新的全球性气温升高。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传播息息相关,科学技术只有传播到不同国家与地区,才能通过不同的具体环境产生新的发展,通过人们实践的多样性不断进步。一种科学有不同的技术方式,进而产生不同的生产方式,这是科学技

术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例如,中国的四大发明传播到西方后,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的航海技术的发展,加速了西方商业文明的发展进程。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时会采取极端的方式,二战时期围绕战争的科学技术奠定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例如,破解发报机密码的机器成为计算机的雏形,导弹技术的研发激发了人们的月球梦,原子能的研究使人类走进核能时代。然而,这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人类不断反思的过程。美国哲学家诺顿认为,应该建构一种新的人类中心主义,既利用自然又保护自然,以代替资本主导下的浅层生态观。然而我们不能盲目地批判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所包含的效率原则是不能被剔除在生态范式之外的,我们应探寻科学技术的目的性价值被忽视的原因,以保障科学技术的手段性价值得以合法运行,使之成为科学技术范式的一个有效的附属环节。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不代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引发人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进一步将思考延伸至科技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视域。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之最高价值与诉求,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活动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有精神需要、精神活动。科学技术属于人的精神活动的求真层面,人只有在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才能不断丰富人自身的实践能力。艾比尼泽·霍华德^[5]从人文主义出发,认为城市社会的生态逻辑首先是生态意识下的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其次是构建与自然空间和谐的适度城市,最后是在主体互利互惠的原则下建设田园城市。帕特里克·格迪斯^[6]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但思想并不是同步前进,也极易产生思想的牢笼与停滞。他把工业时代划分为旧技术时代与新技术时代,认为

旧技术时代的主要特征是浪费、掠夺、生活恶化与无限享乐,最终引发社会战争,而新技术时代以新技术为手段,重新审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生活意识,通过教育重新点燃人们的信仰精神,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建构城市之美与城市精神,以生态学为目标建设差异性 & 个性化的生态城市。刘易斯·芒福德^[7] 提倡文化城市,主张城市社会的生命性与生态性,认为城市发展的经济追求与欲望思维是造成城市问题的罪魁祸首,城市是现代人们生活的母体,整体的生命城市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须能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最后包括人类的全面功能与任务,只有构想出这样一种新秩序,我们才能为城市找到一种新的形式。

对科学技术范式与人文社会范式的反思共同指向与激活了生态范式,并彰显了其所内含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属性。但是,科学技术范式把生态范式扩展为单一的自然范式,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为了间接关系,并且把人的感性抽象化;人文社会范式强调人的精神性与主体性,过度强调人文的社会性,又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这两种范式的不同旨趣造成了人们在知识论层面上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分裂。盲目迷信科学技术范式的万能,会压制伦理范式产生极端的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把政治范式压缩为强权主义思维;盲目迷信人文社会范式的万能,会把人转变成主观任意性的原子式个人,致使人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历史性的社会整体被解构。生态范式的合法性意蕴在于生态的空间性与城市性,在于生态的对象性关系构建。生态范式不仅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也包含自然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同时也是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恶化。生态范式必须同时包含以上几种关系,才能形成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生态。生态范式首先应该包含生态意识,其深层本质

是城市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其次是对自然的敬畏,即把自然、社会与人自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再次是倡导有限生态,保持城市社会的有序性与多样性,避免系统之间的过度侵入,提倡城市的全面生命本质;最后是主张生态调试,通过内化生态理念,不断调试城市的生态关系,确立具体的生态制度与生态行动,实现人创造城市与城市创造人的统一。生态范式内在于科学技术范式与人文社会范式,这种内化自身具有复杂性,在知识论上表现为新的知识群,并成为当下城市研究的热点,如智慧城市、生态城市、伦理城市、海绵城市等。生态范式的激活过程展示了城市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高度统一。

四、中国城市社会的总体性发展范式与城市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由具体发展范式之间的纠缠而形成的一般发展范式,只是分析现代城市社会的一个视角,“城市是人们积极的聚集行动发生的场所”^[8]。城市社会的发展逻辑同样也是各个具体发展范式的综合,是包含多样性的总体性发展范式。城市社会的发展不是范式的细化,而是综合性的城市反思与城市自觉,即在各个范式的交融中不断寻找城市发展的可能性范式。城市社会的总体性发展并非构建一个完美的范式体系,范式的反思与自觉和城市社会的问题是同构与共谋关系。城市社会发展的问题性与复杂性催生一般发展范式与应用性发展范式,这就需要人们打破经济学、政治学、逻辑学、历史学、生态学、宗教学、艺术学、美学与哲学等学科之间的视界隔阂,超越经济人、道德人、政治人与社会人之间的主体性鸿沟。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城市社会的发展范式也不断被激活与延展。新的城市问题不断引发新的反思,上文中提及的几种发展范式在逐渐成为显性范式的过程中也会不断诱发新的城市问题,这些显性范式在城

市社会历史舞台上的主导性将逐渐暴露出自身的缺陷,成为城市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与此同时,这种阻碍会把隐形发展范式激活或者促成新的显性发展范式的诞生。城市社会的空间固化问题进一步凸现出创新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创新范式是理解城市生命与生态、城市衰败与城市繁荣,加速和保障城市活力的重要机制。城市问题的深化引发人们对伦理范式的语境与内容的思考转换,伦理范式的开放性与非自足性要求我们不断建构弹性的伦理关系。现代城市社会的发展既面临新的机遇又面对新的挑战,使城市社会蕴含高度的不确定性,并赋予城市社会成为具有新特质与新内容的风险社会。城市社会的总体性发展范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构建包含着时代问题意识、批判意识与实践意识,对发展范式的研究无疑有助于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确立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目标、价值与意义。

事实上,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成就与问题复杂交织的过程。1990年代中期,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30%左右,目前已达到50%左右,并可能继续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推进。据预测,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以上,基本建成城市社会。^[9]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在东部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正如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10]。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也会不断产生社会冲突与矛盾,诸如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生态恶化、信息安全、户籍羁绊、高房价与城市公共交通等。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要深度把握中国城市社会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通过不同城市样态,不仅在城市

内部形成相互交融,而且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形成相互交流与和谐的样态。中国城市社会的总体性发展逻辑的指向是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城市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指向性就是中国城市命运共同体的弹性构建,既形成城市交往的共同秩序,又保持城市交往之间的差异性张力。就目前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阶段与发展问题而言,中国城市社会的总体性发展范式构建与城市命运共同体的形成需要以下几点的支持。

其一,构建以包容性、兼容性与公共性为基础的弹性城市空间与城市制度。城市社会的弹性张力的核心是保持差异的流动性,差异与流动可保障主体间性与城市间性的动力和效率,抵制阶层与城市固化。各个具体的、具有不同生活与文化背景的主体平等进入、相互尊重、相互融合、相互学习,可以把异质性的主体整合成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突出政府在现阶段的主导作用,建设公共设施,宣传公共价值理念。营造异质性范式与主导性范式的共在空间,确保城市权利与权力的统一。

其二,构建与中国特色城市社会相适应的历史文化。深刻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底蕴是把握中国特色的关键。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民族性格的实现方式与体现,是中华文明的独特内涵展现,是中国城市社会个性在世界性城市社会中的独特存在。传承优秀的历史文化是创新城市社会发展范式的出发点,是走出模仿逻辑困境的指南针,同时也是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精神根基,亦是城市社会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转换的软实力发展的关键所在。

其三,以有限范式的自觉合理应对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代价与风险选择。中国城市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突显的时代问题的易变性与复杂性,要求我们在解答所有城市问题时要避免采用一元范式或一般范式。当今城市发展

风险较以往社会发展阶段表现出高度的综合性与杂糅性,而社会发展并不是没有任何代价的,需要人们在风险面前承担自身的价值性选择代价。城市命运共同体的合理构建,需要确立有限范式自觉以破除风险困境,这种有限范式自觉包括主体性有限、生活有限、消费有限、生产有限、生态有限等。有限范式是把握城市现实与城市理想之间张力的桥梁,通过不断调适主体性与对象性关系之间的特殊性与不确定性,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与长远利益的实现。

其四,“此在单元”的微观视域是推动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落脚点。“此在单元”是不同的家庭、社区、日常生活的实在场域,是人们的共性与个性基本关联单位,城市命运共同体合理性构建是宏观性政策与各项制度实现的合法性路径与社会发展的稳定基础。“此在单元”之间的差异性及其共融性,是宏观环境正义化与公平化在实践中使人们获取幸福感和满足感,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所在。因此,鼓励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细心经营家庭与社区的紧密性,给城市社会不断注入活力且形成城市行动与行为合力,是克服奥尔森所指出的“集体行动悖论”的有效方式。

其五,以城市的未来引领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实践理念与实践意识。人的发展史与城市发展史具有统一性,人的未完成性也是城市的未完成性。在逻辑上,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正、反、合”逻辑中的“合”就是人的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合”在哪里,黑格尔将未来“合”于绝对精神;在理论上,黑格尔把历史变成逻辑预设,未来成为一种合理的恐惧,未来向度定义为历史

的虚无与神秘,也是历史的宿命。城市未来的可能性范式与此截然不同。它不是城市的虚无,而是必然与偶然的统一,是人与自然、历史的统一。城市的未来与城市的历史的贯通就是批判性的城市问题求解从自在到自为再到自觉的过程,城市的未来的筹划亦是城市的物质空间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统一,城市意识的超越性与精神性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然环节,由此使得城市的未来变为现实。

参考文献:

- [1] 勒菲弗. 空间与政治[M]. 李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65.
- [2] 陈忠. 空间与城市哲学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1.
- [4] 陈忠. 现代性的情感逻辑:历史生成与城市调适[J]. 学术研究,2015(1):12.
- [5] 霍华德. 明日的田园城市[M]. 金经元,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
- [6] 格迪斯. 进化中的城市: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M]. 李浩,吴骏莲,叶冬青,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33.
- [7] 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M]. 宋俊岭,倪文彦,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2.
- [8] 科斯托夫. 城市的形成[M]. 单皓,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37.
- [9] 陈思. 关于城市化的哲学沉思——论城市哲学的建构[J]. 城市问题,2011(2):2.
- [10] 期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M]. 吴象婴,梁赤民,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